

地方融资平台岂能沦为私人提款机

“每日一评”

分管干部一通电话,就能从融资平台挪用800万元公款为私人提供贷款;4年间,国有资产被套取上千万元,有干部从中捞取好处数十万元……近日,江苏海安市纪委监委办了一起基层融资平台职务违法案件,涉案金额之巨、情形之恶劣令人咋舌。地方融资平台成私人提款机,暴露出管理不规范、干部职工规矩意识淡薄等多重问题。

地方融资平台管理不规范,国有资产就容易沦为腐败分子覬覦的“唐僧肉”。在该案中,某市经济区委委会分管融资的管委会副主任,长期采用虚构贴现业务、虚增贴现费用等方式套取现金,这些国有资产被套现出来后,有的被用来充实单位“小金库”,解决“账内不好报的费用”,有的被挪作他用,有的直接被个人侵吞。如此肆无忌惮,归根到底还是因为相关财经纪律要求和管理规范没发挥应有的作用。

地方融资平台沦为私人提款机,有不少现实的根源。多数

平台转型升级滞后,未能真正剥离政府性融资职能。它们未能转型为市场化运营的国有企业,不善于依法合规开展市场化融资,仍是政府部门的“钱袋子”。当前,部分地方政府融资压力极大,一面要还旧债清欠款,一面要借新债促发展。“捡到篮里都是菜”“把钱搞到就是王道”……地方政府的现实需求,纵容了融资平台的野蛮生长。

调查显示,不少融资平台决策程序的不规范,内部缺乏审计监督制度,平时重业绩轻监管,内部治理架构缺失。加上融资业务专业性强,流程和核算方式十分复杂,融资平台管理者与银行从业人员、中介勾结一处、监守自盗,是长期以来监管的痛点和难点。这就给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借信息壁垒哄抬融资成本、攫取国有资金的可乘之机。

不可否认,长期以来,地方融资平台作为一种融资方式,解决了地方政府部门的融资难题,促进了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但是,这些平台也更容易成为腐败案件高发区域。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大对金融领域反腐力度,对存在腐败问题的,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对此,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有必要将融资平台的规范

化建设、转型升级发展与反腐败工作同步抓紧抓实。既要形成对这一领域的反腐高压态势,也要加快推进相关企业改革发展,决不能放任融资平台沦为私人提款机,放任国有资产流失。

防范“内外勾结、监守自盗”风险,首先要管住“关键少数”。一个电话就能挪用巨额公款的教训很深刻,应当强化对银行、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关键岗位人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抓好警示教育。对有禁不止、空转套利等违法行为严查严打、毫不手软、绝不姑息。

制度是最好的约束。这类案件启示有关部门,应加强制度设计,规范融资平台日常运营管理,围绕融资高频风险点,列好权力清单,对融资行为实施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监督。同时,建立纪检监察、金融、财政等部门的协调联动机制,实现金融全流程的监察、监管。

长期来看,畅其流才能通其弊,不断完善政府融资渠道和机制建设,从根本上转变地方融资平台的职能,杜绝乱象滋生。

(本报评论员杨绍功)

说好了不给孩子报班,为何又反悔

身为一名“85后”,我一度认为中小学减负这事儿和我没什么关系。但当自家孩子今年9月就读小学后,我开始关注各种谈教育减负的文章。自打孩子上学起,每周末、原本和孩子的相处时光,基本都被课外班和写作业占据。幼儿园时父慈子孝的玩耍互动,变成了如今学习桌旁的鸡飞狗跳。

我经常跟孩子讲起我的小学时代。那时候,每天晚饭前的时间,就足够完成当天的作业。饭后我便跑到村里找小伙伴一起玩耍。

说实话,孩子现在的学校作业比我小时候确实少了很多。据我观察,课业负担重,主要责任不在老师,而来自家长的焦虑。

孩子读幼儿园小班时,我就在家“约法三章”,不上课外班,让孩子享受成长的快乐。可一年后,我就被自己“打脸”了。

幼儿园门外接孩子的家长们,总会讨论谁家孩子上了什么班;同事、朋友的孩子,有的还没上幼儿园就读了早教班;就连城市广告牌、推广课程的骚扰电话,也在不断提醒我,别的孩子已经开始跑了,别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身处这种焦虑的氛围,想不焦虑很难。再三思索,我给孩子报了第一个课外班。

当了家长,我才发现,想淡定地培养孩子并不容易。这种焦虑不是哪个人、哪一区域独有的,而是普遍性的。

说实话,有些家长,是出于焦虑心理报课外班。而更多的家长报班是被教育减负政策“逼”的。

现在小学三点半就放学了,双职工家长想去接孩子,除了翘班或早退别无选择。据我观察,一般单位六点半下班,如果不早退去接孩子,就只能把他“送”给“小饭桌”或托管班。

眼下减负的主要手段,是减少学生在校时间。虽然有一定合理性,却给双职工家长添了不少困难,家长很难叫好。

另外,现在的减负,从数据上来看,确实效果明显,但家长的获得感却没有明显提升。

学校减了时间,其他地方肯定就得加上。教育的事,学校不做,就只能家长做,而家长时间精力又不够,就只能去培训机构做。

高喊减负口号谁都会,但要让学生、家长从教育减负中有更多获得感,并不容易。希望相关部门能多考虑减负政策的可操作性、统筹考虑学生在校时长,让学生真正从减负政策中获益。

(张扬)

地方政府“耍赖”,也该进失信“黑名单”

“因为缺乏有效监督,个别地方政府就像‘脱缰的野马’,折腾了当地民营企业,又耽误了当地经济发展。在一些地方,失信的地方政府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但更多时候,地方政府‘耍赖’,民营企业却没有太多办法

近年来,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各级政府诚实守信,尊重与民营企业签订的合同,不能“新官不理旧事”,但依旧有个别地方当作“耳旁风”,导致当地营商环境差,民营企业不敢来投资,担心被“关门打狗”。这些地方政府“耍赖”的行为,究竟谁来管,又该怎么管?

不久前,重庆的一家新材料科技公司负责人向记者“吐槽”:几年前公司以6000万元的价格,在西南某省拍得一处矿产,由于跟当地国土部门在付款方式上存在分歧,双方便签订了延期支付采矿权价款的协议,约定异议消除后再另行签订协议。谁知过了一段时间,当地国土部门一纸“行政命令”,要求该公司在限定时间内一次性支付价款,否则便对矿产另行拍卖。任企业如何讲“行政命令不能大于法律”的道理,对方就是不听。现在,该企业面临采矿权流失的风险。

地方政府不讲诚信,除了会给民营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还有可能让民营企业家遭受人身威胁。不久前,西部某市的一名民营企业家在区县投资时,遭遇了一场“惊吓”:该区县单方面将原本划拨给该公司作为农贸物流园区的土地,划拨给了另外一家钢材交易企业,导致农贸物流园区无法实现功能,前期上亿元投资打了“水漂”。该企业找当地政府协商,当地政府不予理会。企业没办法,只能按照双方合同规定,找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谁知,当地政府竟以“敲诈勒索”为由,对企业进行调查,威胁企业必须撤销仲裁。

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的行政资源,就足以令民营企业心惊胆战,更别别说采用“组合拳”了。多数情况下,民营企业只能“哑巴吃黄连”,把苦往肚子里咽。如果政府“耍赖”威胁民营企业生存,企业无路可退时,才不得不跟政府“较真”,通过信访或者寻求法律救济,以期找到公平正义。

有些民营企业叫苦不迭,“你想走法律程序,当地法院往不理;你想写举报信,信转来转去,最后转给了当地。”被逼无奈的民营企业,最后还得求当地政府。这样一来,民营企业更加被动。

从表面上看,某些政府确实很“威风”,让民营企业唯命是从。然而,“好事不出名,坏事传千里”,一家企业在这里栽了跟头,其他企业没多久就会知道,传来传去,最后谁都不敢来这里投资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投资跟不上,产业发展不起来,贻误发展时机的还是地方。民营企业受伤后,难免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再投资时,必然会慎之又慎,乃至“宁可守成,不愿拓土”。

地方政府讲诚信至关重要,这不仅关乎政府诚信,更关乎经济发展。在一些地方,因为缺乏有效监督,政府就像“脱缰的野马”,折腾了当地民营企业,又耽误了当地经济发展。

随着社会诚信体系日趋完善,个人“耍赖”,将被列入“黑名单”,日常出行、消费都将受限。企业“耍赖”,也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融资贷款、投资投标等也会受到限制。在一些地方,失信的地方政府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但更多时候,地方政府“耍赖”,民营企业却没有太多办法,只能“头疼不已”。

2018年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关心民营企业发展、民营企业家长成长。不久前,中央又出台意见,提出建立政府诚信履约机制、建立政府失信责任追究和承担机制,要求各级政府认真履行在招商引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活动中与民营企业依法签订的各类合同,对民营企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改变政府承诺和合同约定而受到的损失,要依法予以补偿。

这些具体要求,切中了改善营商环境的“痛点”,也击中了个别地方政府“耍赖”的要害,相当于给“野马”套上了“缰绳”,让不少民营企业备受鼓舞、信心百倍。

一些民营企业家说,政府守信是最重要的营商环境。当务之急,要将这些具体要求转化为具体措施,将具体措施转变为具体行动,让民营企业看得到实效、感受到变化,只有这样才能提振其创新发展的信心,创新发展的信心才能转化为推动经济进步的动力。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面对当前国内外风险挑战上升,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局面,充分释放民营企业的活力势在必行。

“城门立柱”的故事告诉人们,欲立规矩必先立信誉。有关方面不妨将一些“耍赖”的地方政府当作反面案例予以公布,这既是立信、也是立规矩,让一些抱着侥幸心理的地方政府打消念头、收起性子,老老实实遵守契约精神,扎扎实实改善营商环境,踏踏实实服务经济发展。

(本报评论员韩振)

新华融媒选粹

字述 2019：法



回望 2019,有关法治的一幕幕,一定在你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扫描右侧二维码,一起感受这一年法治如何关照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你的 2019,是什么颜色?



明艳、华美、宁静、激越……每一种色彩鲜明的照片都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也传递着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这一年,世界各地的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个个色彩斑斓的瞬间,也用一张张以色彩见长的照片,构成了人们记忆中精“彩”纷呈的 2019 年。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社视频号《你的 2019,是什么颜色?》。



2019 年的“24 小时”微记录



2019 年就要过去,这一年,你过得如何?有过什么欢喜,经历哪些遗憾?每一天,我们的身边都有很多事情发生。世界,也是这样。伴随时光流转,纷纷攘攘,风云变幻。

这一年,世界在发生着什么?新华社社记者带你回顾即将过去的 2019。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社视频号《年终报道 | 24 小时微记录: 2019,世界在你眼前》。



(上接 1 版)剑河县所有人力、物力、财力向脱贫攻坚一线“下沉”。全县 301 个村划分为 1570 个网格,先后抽派 2194 名干部下沉到各村组担任网格员。以县委宣传部为例,部里一共有 17 个人,除办公室主任和财务两人“留守”外,其他人员全部下乡扶贫。“我们尽锐出战,几乎可说是全员出动。”县委宣传部长胡朝庭说。

六盘水市水城县的县、乡两级干部下沉比例超过 63%。其中县直干部 3056 人驻村实行“轮战”,每三个月轮换一次,每期下派三分之一。乡镇一级则 90% 下沉到村。

铜仁市石阡县 2019 年初已“减负摘帽”,如今仍然保持摘帽前县县级指挥部、乡镇前线指挥部、村级驻村工作队、组尖刀班四级作战体系不变、帮扶力量不减。目前,共有驻村第一书记 174 人、驻村干部 354 人、脱产结对帮扶干部 1054 人。

一线“追”干部 “我就像长在这里了一样”

干部在干什么?记者踏上追访路途。

后坪乡是沿河县最偏远的一个乡镇,路上需要穿过重庆两个县,跨越乌江,翻越数座大山。记者赶到下坝村小龙虾养殖基地时,虽天气寒冷,基地却热火朝天。小龙虾育苗大棚已见雏形,几名驻村干部正帮忙搭建、焊接,记者从中找到了从县农业局下派的青年驻村干部赵军。

赵军说,由于离重庆市场较近,养殖环境好,后坪乡养殖的小龙虾卖得火,已带动 220 户贫困户增收。马上迎来育苗时节,为了防止虾苗冻死,他们正赶着搭建大棚。赵军已经驻村 8 个月,每个月至少在村里 22 天。

侯元军就是沿河县畜牧兽医局那个因长期驻村,以致办公桌都没给他留的干部。他在局里的岗位是办公室主任,在村的岗位是第一书记。记者赶到官舟镇红星村找他时,得知他回城去看病了。

记者掉头进城找到他家时,丈母娘抱着侯元军的刚出生嗷嗷待哺的二胎女儿,他本人正准备去医院看望生产不久、还在住院的妻子张红艳,之后就要下村。驻村时侯元军肚子疼了几个月没当回事,直到疼到起不来床,他这才去了医院,被诊断为肾结石。想到村里脱贫的事等着,他决定不住院手术,保守治疗。

斜挂着驻村常用的军用水壶,侯元军赶到县人民医院急诊科。由于床位紧张,他妻子只能躺在走廊过道的病床上。侯元军摸了摸妻子的额头:“嗯,没那么烫了。”一瞬间,张红艳红了眼眶。“村里扶贫任务重,我今天得赶回去,你保重。”张红艳点点

头。侯元军转身嘱咐了特意从上海请来照顾妻子的妻妹后,下楼赶往村里。

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平均海拔 2200 米,常年大雾弥漫。沿着盘旋陡峭的新修水泥路,记者来到石门乡泉发村,大雾中找到了青年女乡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宋冰。刚从地里回来的她,鞋子上沾满了泥巴。埋在地里的中药材草乌即将收获,为预防“卖难”、提高种植利润,她争取了上级项目支持,正在筹办简易的中药材加工厂。

2017 年,研究生毕业的她考取选调生,到乡政府就职 20 天后便被派到泉发村驻村。驻村两年来,宋冰除了几次外出培训外,几乎每天都在村里忙碌,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就像长在这里了一样”。

据贵州省委组织部、贵州扶贫办统计,截至 12 月中旬,贵州省共有 8848 名第一书记和 3.68 万名驻村干部在精准扶贫一线带头攻城拔寨。

按照中央东西部扶贫协作安排,2019 年,东部 9 城市选派 311 名挂职扶贫干部和 2093 名专业技术人才,前来贵州结对帮扶。在威宁九中,记者找到了来自广州市番禺区的青年物理老师祝声彦,他是今年 2 月份来到威宁九中帮扶。在办公室,他一股脑搬出他的“宝贝”——利用课余时间制作的螺丝陀螺、气弓箭。今年他策划了全校第一届科技运动会,这些寓物理知识于其中的“好玩”物件,大受学生欢迎。

为民新“穷根”

“你是否真心帮扶,老百姓看得一清二楚”

2018 年 3 月,由于帮扶两年的木梓岭村已脱贫,侯元军被调到相邻的红星村扶贫。走的那天,木梓岭村民自发放起了鞭炮,送他到两村交界处。

侯元军学的是水产养殖专业。为了帮助村民发展产业,他将老丈人家的耕田机借来放在木梓岭,免费为各家耕田犁地。为了便于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他买了辆二手小型皮卡车,也成了村里免费运输车和“急救车”,几次夜里村中有人突发疾病,都是他第一时间开车将病人送至医院。

追访中记者得知,在红星村驻村扶贫期间,侯元军用自己的名义从银行三次贷款共计 26 万元,帮助全村脱贫,帮助贫困户解难。

第一次是 2018 年 6 月,红星村发展金银草、牛、鸡三项产业,一时缺少资金 20 万元,侯元军便贷款 20 万元给补上了;第二次,去年 8 月,贫困户田江雨在耕田时脚受伤,造成粉碎性骨

折急需用钱,侯元军贷款 4 万元帮助他;第三次,今年易地搬迁到铜仁市的田江雨想做快速代领生意,需要 2 万元押金,再次想起了侯元军,侯元军二话没说又去银行贷款给了他。

已脱贫的田东芬向记者称赞侯元军:“这个人值得打满分!每家每户,他都会用全力去帮助。”

威宁县石门乡,阴雨连绵,这让宋冰感到有些焦躁,她正在盘算到底哪一天召集村民采摘草乌。受石漠化土地和大雾限制,很多作物在泉发村难以生长,只能种玉米、土豆,“穷根”难除。宋冰号召村民种过核桃,失败后她愧疚不安。后来她请来农业专家,开展试种后确定草乌非常适合种植。

“如果市场稳定,现在种植一年草乌的收益相当于过去种 10 年的玉米。去年有一贫困户在种下草乌后,有各种担心,总是质问我行不行,最后,他家不足一亩地的草乌,卖了 13000 多元。”宋冰自言驻村经历了“语言关”“思想关”和“感情关”,“跟老百姓说惯了方言,我现在说普通话反倒舌头打结”。

在大山里的威宁县新发乡,记者找到了从毕节市政府办下派驻村的李大奎。他身着一件黑色棉袄,皮肤晒得黝黑,沉默,少言。然而,当记者跟着他来到所驻扎松发村时,他就像变了一个人。在山坡上和农房间快步如飞,介绍脱贫进展滔滔不绝。

接连带领两个村脱贫后,今年 6 月底,松发村这块“硬骨头”交到了他手上。这是一个极难攻克又必须攻克的贫困堡垒,如松山组 50 户农户只有 2 户有厕所。不到半年,他带队交出成绩单:发展贫困户养牛 74 头、养蜂 99 群;99 户贫困户中已落实就业 142 人;2 名辍学学生已重返入学;37 户居住危房的贫困户,房屋改造主体工程完工……

看到李大奎来了,已计划申请脱贫的中年彝族农民陆忠成就像碰见熟人、亲人。“老李来我们村 3 个月,村里的变化太大了。”过去在福建打工、因工伤断掉一节手指的他,把记者带到山坡上看他栽种的 1 亩多蜂蜜李。“脱贫政策这么好,我下决心不再外出,在家安心种养,同时照顾孩子读书。”

“你是否真心帮扶,老百姓看得一清二楚。”李大奎说,这是自己驻村 4 年的最大感受。

“舍家”为脱贫

“我们对不起父母、妻儿,但对得起脱贫攻坚事业”

因为屡次出手帮助贫困村和贫困户,侯元军在一些人眼里家徒条件“富裕”。

记者到县城找到他家时,意外地发现,他家住露天农贸市场旁边的一栋廉租房的八楼,面积只有 53 平方米,多几个

人走动就显局促。屋里没有像样家具,电视机柜是他自己用几块木板组装的。他不好意思地说,妻子这些年因为照顾孩子、支持他驻村扶贫,一直没有上班,家里全靠自己的收入,买不起商品房,符合低收入家庭条件,于是申报、购买了廉租房。

侯元军前两次帮助贷的款,村集体和贫困户都已归还。说起这些经历,他语气很淡定。“这不是什么大事,驻村这么久了,村民就像是我的亲戚,亲戚之间借钱是正常的!”

“他扶贫的责任心很强,总怕做不好、做不够。”躺在病床上的张红艳告诉记者,自己理解、支持丈夫侯元军的工作。她自己还曾多次带大女儿一起到村里帮贫困户收庄稼。

宋冰所驻泉发村距离自己家 100 余公里,很少有机会回家。“只要哪天村里的喇叭没有响,很多村民就会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没有在村里。”前段时间她回了趟家,妈妈对她说:“好不容易回一次家,却半夜才回来,一大早就要走。”

记者到访时,全村刚刚举行完脱贫民主评议会议,拟脱贫户 89 户,举手表决一致同意申请脱贫。

宋冰说:“脱贫攻坚战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一定要打赢这场战争。”

今年 2 月,祝声彦来到威宁九中,原本计划是帮扶半年,自愿延长到一年。今年 8 月底,当回到番禺的他拖起拉杆箱,准备离家出发返回威宁,两岁的孩子突然说了一句:“别走,我要爸爸。”说起那一刻,祝声彦动情落泪。

“在番禺区上课,我要用很多时间管课堂纪律,而在威宁九中,这些淳朴的孩子没一个上课打瞌睡。”带着科技制作“宝贝”已走遍全县多个乡镇学校的他恋恋不舍,“在威宁上课是一种享受,看到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我舍不得走。”

提到 12 岁的女儿,谈全村脱贫工作手舞足蹈的李大奎,转而有些愧疚。因为妻子前些年也在乡镇工作,上小学的女儿常年一人在家。“有一次回家,看到女儿正端着锅做饭,饭没煮熟,做不出蛋炒饭……”讲到此处他不由红了眼眶。

为了勉励女儿,李大奎有时发微信给她,分享自己一线扶贫的故事和心得,“让她看看贫困村的孩子条件有多艰苦,知道自己爸爸做的事有意义。”让他非常感谢的是,市政府办前不久将他妻子从乡里调到市里,解决了后顾之忧。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是一场伟大的战争,是战争总要有付出、总要有牺牲。”在向驻扎全乡各村的下沉干部动员时,毕节市政府办驻新发乡帮扶工作队队长李永喜吐露心声,“我们对不起父母、妻儿,但对得起新发乡四万多各族群众,对得起脱贫攻坚事业,对得起自己的青春年华。”

新华社贵阳 12 月 26 日电

本报全国代印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金华、宁波、福州、南京、济南、武汉、西安、成都、郑州、哈尔滨、长沙、贵阳、广州、南昌、重庆、合肥、兰州、银川、昆明、南宁、沈阳、长春、太原、石家庄、乌鲁木齐、呼和浩特、海口、拉萨、西宁、青岛、喀什、无锡、徐州、台州